

报酬递增视角下国际话语权的生成机制^{*}

杨沛鑫 田野

【内容提要】 国家何以在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中获取国际话语权？作为反映一个国家对国际体系中权威生成与行使的理想模式的具体表达，国际治理话语能够在报酬递增机制的作用下促进国家获取国际权力。在学习效应、协调效应与适应性预期的作用下，国际治理话语的初始优势可以转化为长期优势。首先，学习效应强调既有客观知识的影响，通过对既有语境平台和内容的借鉴，提升国际治理话语的正当性与有效性，并推动建立话语的初始优势。其次，协调效应强调系统间的互动，通过推动治理话语在不同领域和层次间的协调，使国际治理话语的影响从单一领域与层次向外扩展，令初始话语优势得以巩固。再次，适应性预期强调主观认知对未来的框定，利用既有话语优势塑造国家对未来可能发生情景的认知，使其他行为体实现对叙事剧本设定的主动认同。在学习效应、协调效应与适应性预期的影响下，“自由国际秩序”这一治理话语在二战后不断推动美国积累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优势，巩固了美国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但其当前面临着自我消解的问题。基于国际治理话语的报酬递增效应，中国需要有效利用话语策略，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应对国际挑战。

【关键词】 国际治理话语 国际话语权 报酬递增 自由国际秩序

【作者简介】 杨沛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yangpeixin@ruc.edu.cn

田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电子邮箱：tianye@ruc.edu.cn

^{*} 本文系 2023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现代大国兴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研究”(23&ZD038)的阶段性成果。

话语是观念所凝结的概念进行互动和发挥作用的载体,它不仅能够作为一种结构在互动中对不同的主体进行区分,同时还能推动其所描述的对象发生进一步变化。^① 对于国家而言,话语的生成及变化不仅影响一段时间内的社会政治思潮,还会对物质领域产生干预作用,话语由此成为了国家关注的重要领域。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指出的,新教教义中包含的特质影响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新教伦理对物质世界产生的干预作用促成了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② 无论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日在经济领域的叙事龃龉,^③还是当前中美“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辩,^④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夺贯穿于战后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因此,本文意图探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何以在与其他国家互动的过程中积累话语优势,获取国际话语权?

本文认为,与地缘、技术和制度领域相似,报酬递增机制同样作用于国家在话语领域的优势累积过程。^⑤ 通过与其他国家互动时传播自身的国际治理话语(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discourse),特定国家可能在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s)、协调效应(coordination effects)和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三个机制的影响下实现优势累积,使其在国际治理进程中获取话语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以自身为中心的秩序构建。通过对“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这一国际治理话语案例的分析,本文试图观察,在国际治理话语生成后的一定时间段内,国家如何通过特定策略促成话语领域的报酬递增,并借助话语在传播前后作用范围和程度的差异来

① Jennifer Milliken, "The Study of Discours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ritique of Research and Method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5, No. 2, 1999, p. 229.

② 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③ 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著、于杰等译:《美日博弈:美国如何将未来给予日本,又该如何索回》,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第147—154页。

④ 达巍:《现行国际秩序演变的方向与中国的选择》,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1期,第100—111页。

⑤ 田野:《大国竞争的根源:基于报酬递增机制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第85—103页。

反映报酬递增带来的优势累积。本文意在说明,国家能够在传播特定国际治理话语的过程中,通过学习效应、协调效应与适应性预期来积累优势,从而获取国际话语权。

一、关于国际话语权的既有研究

对于国家而言,话语互动与竞争的重要目的是获取权力。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话语并非价值中立,而是蕴藏着对应的权力关系。^① 话语不仅传递知识和信息,更是权力的体现和运作工具。通过控制某一领域的知识生产,权力掌握者可以决定哪些话题可以被讨论,哪些观点被认可,以及哪些叙事成为“真理”。因此,话语不仅能够作为一种符号以传达系统中独立个体的身份及其代表的意义和价值,更在不同身份的界定过程中成为了一种权力工具。^② 福柯等学者的研究揭示了话语背后的权力逻辑,这一逻辑在国际关系中就反映为国家对话语权的追求。由于话语映照出了权力关系,对话语的掌握就代表着国家对权力的获取。约瑟夫·奈(Joseph Nye)指出,对国际舆论的影响力是国家在硬实力以外权力的重要体现,这种权力被其称为“软实力”(Soft Power),而话语是理解软实力的重要维度。^③ 围绕着国际话语权的内涵、主体以及影响因素等问题,大量学者展开了研究,并得出了较为丰富的成果。

首先,国际话语权的内涵受到了较多关注。虽然福柯等学者揭示了话

① David Walton, *Doing Cultural Theo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2; 米歇尔·福柯著、肖涛译:《话语的秩序》,载许宝强、袁伟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

② 关于话语作为一种意义传递符号的研究,可参见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London: Fontana, 1974. 德里达在研究中强调了二元对立的概念界定下所暗示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并指出“西方/第三世界”等对立的身份叙事建立了一个基于权力差异的等级制二元关系。参见 Jacques Derrida, *Posi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p. 41.

③ Joseph Nye,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No. 80, 1990, pp. 153-171; Laura Roselle, Alister Miskimmon and Ben O’Loughlin, “Strategic Narrative: A New Means to Understand Soft Power,” *Media, War & Conflict*, Vol. 7, No. 1, 2014, pp. 70-84.

语的权力面向,但这不足以成为支撑国家追求国际话语权的充分条件。对于国家而言,国际话语权在很多情况下不止意味着通过话语影响与掌控其他行为体的权力,还意味着在特定场合能够拥有发出自身声音的权利。岳圣淞认为,国际话语权既反映权力又反映权利的双重特性体现了不同因素在国家获取国际话语权时发挥的作用:国际话语权的权力面向突出了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竞争性,而国际话语权的权利面向突出了国际规范和国际秩序所具有的有序性。前者可以用“制度性话语权”进行概括,而后者可以用“舆论性话语权”进行概括。^①由此,国际话语权被认为是国家在通过话语传达自身特定理念和价值,并由此在国际舆论场内影响其他国家行为的能力。^②在此基础上,国家对于国际话语权的竞争变得较为复杂,不同国家在不同情况下所强调的话语权往往是制度性话语权和舆论性话语权的重叠,国家甚至可能会出现外宣和外交目标的错配。^③有学者指出,在权力和权利之外,国际话语权至少还包括“代表国家利益”和“展示国际形象”等更加丰富的意义。^④因此,厘清国际话语权的内涵往往是既有研究对国际话语权进行分析的首要任务。

其次,争夺国际话语权的主体是学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尽管国际话语权的主体天然与主权国家相联系,但国际话语权的主体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国际组织和次区域组织等超国家实体,甚至包括跨国公司等次国家实

① 岳圣淞:《场域视角下的国际话语权:理论、现实与中国实践》,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4期,第128—129页。

② 事实上,关于国际话语权的内涵界定较为丰富,但不同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国际话语权所具有的几大特征:以国家为主体、以话语为载体、以影响其他国家为目的。这种界定兼顾了国际话语权的双重面向,并将国家置于话语权研究的核心。部分代表性研究可参见陈正良、周婕、李包庚:《国际话语权本质析论——兼论中国在提升国际话语权上的应有作为》,载《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第78—83页;门洪华:《“一带一路”规则制定权的战略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7期,第19—40页;吴志成、李冰:《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的中国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9期,第4—21页。

③ 刘强:《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内因检视及对策思考——中国对外宣传的技术误区因素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年第4期,第74—90页。

④ 赵长峰、吕军:《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述评》,载《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3期,第153—161页。

体,都是在国际互动中拥有国际话语权的主体。^①但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主权国家仍然是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核⼼行为体。以此为背景,崛起国与霸权国间关于国际话语权的竞争成为了这一议题研究的重点。一方面,霸权国借助自身的物质和制度优势,能够轻易获取国际话语权,由此,话语成为霸权国护持自身霸权的重要手段。在分析冷战后美国维持霸权的过程时,潘亚玲发现美国霸权的衰落反而使其在全球治理的各个领域中通过话语护持其霸权,这种方式能够使美国以抢占道德高地的方式,在其尚未拥有主导地位的领域快速将话语优势转化为制度霸权和规范霸权。^②此外,面对中国的全方位崛起,美国在全球推广的“普世价值”话语受到了冲击,从而进一步触发了美国护持霸权的机制,而这也构成了美国通过重构叙事,以特定的叙事图式对华进行价值观外交的背景因素。^③美国以意识形态为导向,针对新兴国家在技术领域的治理主张,构建排他性的叙事联盟,并将单一的技术领域意识形态化,这充分反映了话语在美国霸权护持过程中发挥的作用。^④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崛起国积极追求国际话语权,并成为自身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途径。尽管在当前的国际事务中,新兴的崛起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其在国际舆论场中仍然处于劣势地位。^⑤因此,新兴国家不满足于对既定政治秩序的追随,而是试图通过“去中心化”的叙事,以非强制

① Laura J. Shepherd, “Constructing Civil Society: Gender, Power and Legitimacy in United Nations Peacebuilding Discours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1, No. 4, 2015, pp. 887-910; 岳圣淞:《国际制度变迁与制度话语权格局的演变——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例》,载《东北亚论坛》,2024年第2期,第100页。

② 潘亚玲:《论美国制度霸权与规范霸权的护持战略》,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153—164页。

③ Maximilian Terhalle, “Containment’s Deceit: Why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Review its China Strateg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7, No. 1, 2020, pp. 79-94; 岳圣淞:《图式演绎、叙事重构与冷战后美国对华价值观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4期,第26—61页。

④ 任琳、孟思宇:《霸权护持、复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秩序的危机》,载《外交评论》,2022年第5期,第53—77页。

⑤ Peter Marcus Kristensen, “How can Emerging Powers Speak? On Theorists, Native Informants and Quasi-officia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scourse,”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6, No. 4, 2015, pp. 637-653.

性的方法改造既有的政治秩序。^①在此背景下,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均塑造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战略叙事。吴琳指出,在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不仅借助其地缘中心和文明古国的地位强调自身拥有的“全球南方”角色,还将“领导型大国”等新的身份叙事融入到自身的外交话语中。^②而中国在参与全球事务的过程中也积极将“一带一路”倡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向外推广,通过不同方式进行传播,以便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的同时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综上,尽管国际话语权的主体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但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话语权竞争中最重要行为主体,而崛起国与霸权国对国际话语权的追求在内容、目标和方法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再次,国际话语权的影响因素是国际话语权研究的一大重点,既有研究强调了话语质量、权力斗争和外生冲击对国际话语权的影响。第一,话语质量是影响国际话语权获取的根本因素,话语质量的高低将决定国家能否将话语传播至目标受众。高质量的话语内容是国家推动话语战略的支撑,而低质量的话语内容则往往会成为国家追求国际话语权的阻碍。^③第二,国家权力斗争是影响国际话语权获取的关键因素。国际话语权取决于一国的国家实力,是国家权力得以体现的重要维度。^④它不仅是国家确立权力优势后的产物,同时也是国家在寻求权力优势过程所依赖的重要工具,而国家间的权力变动往往是影响国际话语权的关键。对于崛起国而言,如何传播其治理知识受到权力结构的巨大限制。对于守成国而言,其在面对崛起国时在

① Kejin Zhao, “China’s Rise and its Discursive Power Strategy,”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 No. 3, 2016, pp. 539-564; Steven Langendonk, “Discourse Power as A Means to ‘Struggle for Position’: A Critical Case Study of the Belt and Road Narrative’s Effects on Foreign Policy Formul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25, No. 5, 2020, pp. 241-260.

② 吴琳:《大国身份叙事重塑与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载《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11期,第1—15页。

③ 张新平、庄宏韬:《中国国际话语权:历程、挑战及提升策略》,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2页。

④ 史姗姗、骆郁廷:《国际话语权的生成逻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5页,第175—182页。

意识形态领域具有天然的防范倾向。^①中美两国在话语沟通领域的激烈竞争正是发生在美国对华战略评估发生系统性转变的背景下,而在此之前,中美的话语互动和外交沟通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对保守和稳定的水平上。^②历史上,由于权力斗争而引发的话语斗争不在少数,冷战本身就是一场重要的叙事“战争”,而这一“战争”不仅局限在对手之间,甚至还发生在权力格局发生转变的盟友之间。^③第三,外生冲击是影响国家获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因素。国家对话语权的追求反映了自身的治理观念和发展道路理想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稳定的。但这种稳定的叙事也可能受到突发事件的冲击,从而出现大幅度的调整。美国对苏联的负面叙事在“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的影响下被大幅强化,这种由外生冲击带来的叙事变化同样体现在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过程中。^④与之类似,美国针对中国的负面叙事在2020年前后受到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影响而强化,美国对中国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以及发展路线的不认同感在外生事件的影响下更加凸显。^⑤由此可见,在既有权力格局不变的情况下,一些突发事件将会为国家获取国际话语权的过程带来外生冲击。

最后,既有研究还关注国家获取国际话语权的手段和方法。国家其在话语领域进行竞争所借助的政策工具往往具有相似的逻辑。薇安·施密特(Vivien A. Schmidt)认为,国家行为体可以通过观念表达、身份塑造和规则建构三种方法以行使话语权。^⑥袁莎则以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为例,指出霸权国往往会通过内部制衡、外部制衡和消极制衡的方式进行话语制衡,以护持自身霸权。^⑦崔磊

① 温尧:《权力与偏见:当代崛起国的治理知识传播难题》,载《当代亚太》,2022年第2期,第4—33页。

② 岳圣淞:《中美话语权竞争的特点》,载《战略决策研究》,2022年第6期,第3—27页。

③ 参见 Lynn Boyd Hinds and Theodore Otto Windt, *The Cold War as Rhetoric: The Beginnings, 1945—1950*, New York: Praeger, 1991.

④ 刘露馨:《美国科技战略的变革及前景》,载《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0期,第37—45页。

⑤ 张志洲:《新冠疫情下的中国“话语处境”与国际话语权建设》,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第52—58页。

⑥ Vivien A. Schmidt, “Does Discourse Matter in the Politics of Welfare State Adjustmen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5, No. 2, 2002, pp. 168-180.

⑦ 袁莎:《话语制衡与霸权护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3期,第85—107页。

与卢凌宇同样指出,美国将通过话语制衡实现霸权护持和拓展泛安全化的目的。^①既有研究反映了共识塑造、压制对手和身份设定这三大机制在国家竞争话语权时所发挥的影响。^②第一,通过话语实现充分的动员是大多数国家积累话语优势的前提,而话语是一种促进集体行动的方式。国家通过叙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保证和协调的问题,并塑造共有认同。^③话语的动员与共识塑造作用不仅在国内得以实现,还在联盟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④因此,无论在国内层次还是国际层次,通过话语实现共有认同的建构都是国家试图争取国际话语权所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第二,话语强制是国家争夺话语权的常用手段。国家往往会通过修辞和叙事突出某些容易被其他政治观众所接受的概念,迫使其对手在政治观众的压力下接受这些概念,从而难以推广自身所主张的概念。^⑤由此,国家通过话语实现压制对手的目标。第三,话语的身份设定作用往往也会对国际话语权的获取带来影响。角色身份的设定传达了行为体对特定议题和政策的立场,也决定了其行为模式。叙事的转变在推动深层身份的变化时,还可能会对表层的偏好与战略选择造成影响。陈拯指出,国家在面对封闭性制度时,可有针对性地调整自身的身份叙事,并为提升自身影响力创造相应的空间。^⑥孙吉胜和

① 崔磊、卢凌宇:《霸权护持与拓展泛安全化:基于日本和印度的比较个案分析》,载《当代亚太》,2025年第3期,第58—85页。

② 米斯基蒙等学者在结果逻辑与适当性逻辑之间建构了一条叙事的光谱,强调了叙事从强制到促进身份认同之间的作用,其论述的核心概念本质上与共识塑造、话语强制和互身份设定三个机制相似。参见 Alister Miskimmon, Ben O'Loughlin and Laura Roselle, *Strategic Narratives: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London: Routledge, 2013.

③ Frederick W. Mayer, *Narrative Politics: Stories and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④ Laura Roselle, "Strategic Narratives and Alliances: The Cases of Intervention in Libya (2011) and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2014),"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Vol. 5, No. 3, 2017, pp. 99-110.

⑤ Ronald R. Krebs and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Twisting Tongues and Twisting Arms: The Power of Political Rhetoric,"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3, No. 1, 2007, pp. 35-66.

⑥ 陈拯:《国际制度封闭性与中国的身份叙事》,载《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3期,第28—58页。

薛丽对美国对华叙事竞争的研究显示,美国往往会通过叙事消解既有的身份,并通过身份标签强化特定的形象特征和角色内涵,以实现对华叙事竞争的目标。^①当然,在上述机制的基础上,还有大量研究探讨了框定、隐喻、安全化、污名化等具体策略在国家话语政策中发挥的作用,但其核心机制与上述三个机制较为相似。^②

综上,既有研究对于国际话语权展开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并从内涵、主体、影响因素与实现方法等不同层次进行了讨论。但既有研究仍然存在可进一步深入之处。第一,既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话语对国家影响的时间性问题。话语在不同物质背景下发挥的作用可能产生差异,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等学者在对规范扩散进行研究时指出,“世界时间”与特殊的时代背景可能会对规范的变化造成巨大的影响。^③作为规范传递的重要载体,话语内容和传播方式会随时间变化而发生巨大变化。因此,需要将时间维度纳入分析。第二,既有研究虽然强调了话语的工具属性,突出了国家在话语领域积累优势的能动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话语作为一种结构产生的影响。^④换言之,对国际话语权的既有研究虽然强调了话语的双重面向,但从根本上而言还是对于国家如何利用话语的探讨,对话语如

① 孙吉胜、薛丽:《叙事竞争与中国“一带一路”叙事体系建设》,载《外交评论》,2023年第6期,第23—53页。

② 参见傅强、袁正清:《隐喻与对外政策:中美关系的隐喻之战》,载《外交评论》,2017年第2期,第85—112页;黄超:《框定战略与“保护的责任”规范扩散的动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第58—72页;岳圣淞:《政治修辞、安全化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7期,第78—103页;曾向红、李琳琳:《国际关系中的污名与污名化》,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3期,第78—111页。

③ 玛莎·芬尼莫尔、凯瑟琳·斯金克:《国际规范的动力与政治变革》,载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332页。

④ 也有研究说明了话语作为一种背景所发挥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并非等同于国家获取国际话语权的动力机制。陈拯强调了话语势能及说辞逻辑在竞争中发挥的作用,而托马斯·里斯(Thomas Risse)则提出了国际关系中的“争论逻辑”,前者所强调的说辞逻辑更加突出工具性,并注重国家如何获取“话语势能”,而后者强调的争论逻辑则更加突出互动性,参见陈拯:《“话语势能”构建与国际话语塑造》,载《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2期,第156—174页;Thomas Risse, “‘Let’s Argue!’: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1, 2000, pp. 1-39.

何影响国家的权力累积过程仍未充分揭示。由此,本文试图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基于报酬递增的视角来理解国家如何通过国际治理话语累积优势,并分析作为一种结构的话语推动国家获取权力的动力机制。

二、国际治理话语、报酬递增与国际话语权的获取

虽然话语是国家间争论并达成共识的一大手段,但国家的话语争论往往为了追求私利而展开。^① 因此,国家能够利用话语为自身累积优势,并在与其他国家互动的过程中将优势放大。在此背景下,国家能够基于特定的话语内容,获取国际话语权。

(一) 国际治理话语与国际话语权的生成

话语在社会结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话语制度主义将制度视为一种由行为体背景知识和表象话语能力建构的结构,认为话语不止是传递观念的文本,其存在和互动本身就具有价值。这样,话语不仅能够作为一种工具而拥有能动性,还是宏观结构的一种体现。^② 话语的结构属性为国家通过利用话语实现优势累积提供了基础。一方面,话语是可塑造的,国家能够通过特定政策和战略将自身意图传达的价值观念以不同的方式概念化,并根据情境形成特定的话语。话语一旦形成,就会在主观认知和客观存在两个层面对国家自身和话语受众造成影响。另一方面,话语是可累积的。尽管与物质因素相比,话语更迭的直接成本相对较低,但话语一旦作为结构被固定,其就会对后续的行为体互动带来重要的影响。由于话语领域的前后关联,既有话语会影响新话语的生成。这样,由于话语既是一种工具,又是

① Nicole Deitelhoff and Harald Müller, "Theoretical Paradise: Empirically Lost? Arguing with Haberma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1, No. 1, 2005, pp. 167-179.

② Vivien A. Schmidt,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Ideas and Discours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1, No. 1, 2008, pp. 303-326.

一种“导向特定方向的意义结构”，^①通过话语累积形成的权威将在行为体互动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国家间互动的过程中，它们主要通过国际治理话语以传递自身对特定议题的认知与立场，并在此基础上追求国际话语权。国际治理话语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对国际体系中权威生成和行使的理想模式的具体表达。在全球治理理论的代表性学者迈克尔·祖恩(Michael Zürn)看来，治理不仅指受到认同的规则和规范，还指在事务处理中发挥的权威形式。^② 由于国际体系不存在一个拥有最高权威的世界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权威之间的互动。因此，全球治理体系不仅包括由利益认知、权威存在及权威行使组成的规范性原则，同时还存在着由权威互动带来的合法性问题。^③ 在此背景下，制度性话语权的获取成为国际治理的重要维度。正如任琳指出的，全球治理秩序具有功能和权力的双重属性，功能属性反映了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利与合作面向，而权力属性则突出了国家在全球治理过程中的自利与等级面向。^④ 话语权在全球治理的这两个面向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国际体系中，权威的生成和行使受到话语的重要影响。在阎学通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看来，拥有道义往往能够推动国家获取国际权威，^⑤ 遵循道义能推动国家获取国际话语权，借助和参与制定全球治理规则是国家追求道义的重要方式。^⑥ 基于对道义的追求，国家依赖制度来引导和参与全球治理。通过制度进行的治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通过话语进行的治理，因为制度既是塑造行动者思考与言说范围的结构因素，又是由行动者话

① William E. Connolly, *The Terms of Political Discours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

② 迈克尔·祖恩著、董亮译：《全球治理理论：权威、合法性与论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页。

③ 同上，第8页。

④ 任琳：《“退出外交”与全球治理秩序——一种制度现实主义的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1期，第84—115页。

⑤ 参见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第102—128页。

⑥ 徐秀军、田旭：《全球治理时代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逻辑——以太平洋岛国为例》，载《当代亚太》，2019年第2期，第95—125页。

语实践所创造和改变的产物。^① 基于话语的国际秩序不仅是国家间关系的产物,又是国家间关系的治理机制。^② 国家间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竞争本质上是国家间治理观念竞争的映射。无论在二战末期美英关于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辩论中,还是在当前中国和西方国家间关于发展知识的竞争中,国家一旦获取话语权,就意味着其所倡导的治理模式成为主导,进而会对未来的治理路径产生重要的影响。

国家需要争夺国际话语权,而取得国际话语权的标志就是特定国家的话语成为场域主导话语的一部分,^③国际话语权的获取天然就涉及多个国家的互动。对于国家而言,国际治理话语转化为国际话语权的过程就是在国际治理中通过话语进行互动并积累优势的过程,话语权的积累能够同时提升国家参与治理的能力与意愿。尽管话语权包括“权力”与“权利”两方面的内涵,但通过国际治理话语互动所带动的话语权增长对应了国家通过话语行使权威的“权力”面向。因此,国际治理话语为国家所带来的报酬体现在国家在参与国际治理进程中通过话语互动所累积的“话语权”。所谓“话语权”,是指国家在与其他国家互动过程中,通过传播话语形成的对特定议题的影响力。^④ 由于国家在物质资源、人口密度以及制度基础上所拥有的既有资源并不平衡,某些国家在特定议题下形成的治理话语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话语的互动也会赋予某些国家在此后的治理进程中更高的权威。^⑤ 由

① 马雪松、冯修青:《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建构主义转向》,载《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4期,第135页。

② Kanti Bajpai and Evan A. Laksmana, “Asian Concept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What Asia Want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9, No. 4, 2023, pp. 1371-1381.

③ 岳圣淞:《场域视角下的国际话语权:理论、现实与中国实践》,第137页。

④ 赖克和勒博对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进行了分析,其指出既有研究中的权力过于强调物质因素,将影响力从权力中分离出来,可以进一步讨论话语与影响力之间的关系。其研究说明了话语的报酬本质上就是国家在国际互动中的影响力。影响力最有效的形式就是通过话语劝说,使对方愿意为共同目标贡献出自己的资源。参见西蒙·赖克、理查德·内德·勒博著,陈锴译:《告别霸权!全球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56页。

⑤ José Antonio Flores Farfán and Anna Holzscheiter, “The Power of Discourse and the Discourse of Power,” in Ruth Wodak, Barbara Johnstone and Paul Kerswill,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0, p. 145.

此,基于国际治理话语的互动将会推动国家在国际治理进程中话语权的累积。

(二) 积累国际话语权的报酬递增机制

作为系统中一种常见的正反馈机制,报酬递增机制被广泛运用到国家累积物质资源的解释。自斯密、马克思对分工和生产力的分析开始,到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对于循环累积因果原理的强调,再到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和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在结构主义基础上对报酬递增具体机制的全面分析,报酬递增被认为是国家发展和竞争过程中的重要原理,并从物质领域向制度这一非物质领域逐渐扩展,成为能够解释诸多社会现象的普适性理论。^① 国家通过报酬递增累积优势的方式是通过控制特定的战略领域来实现的。在“干中学”等机制的影响下,国家能够在以往的实践经验中不断学习,从而扩大对既有领域的熟悉程度,并在单一领域建立起初始优势。在此基础上,国家可以将相似的增长经验运用到其他领域,以实现从单个系统到多个系统的优势扩张。而在既有发展路径的基础上,其他行为体能够观察国家发展的模式,并产生特定的预期,国家得以通过“自我实现的预言”不断实现优势的累积。上述逻辑所反映的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及适应性预期在地缘、技术和制度领域得到了不同的体现。^② 上述三个机制对在话语领域同样发挥了作用,从而驱动国家在国际治

① 参见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冈纳·缪尔达尔著、方福前译:《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道格拉斯·诺斯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W. Brian Arthur,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99, No. 394, 1989, pp. 116-131.

② 在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预期之外,布莱恩·阿瑟还认为报酬递增的发生需要建立在大规模启动成本的基础上。但在大国竞争中,大规模启动成本往往不产生主要影响。对于制度等非物质领域而言,“主权成本”带来的影响要高于其本身创立和运行的成本。对于话语领域同样如此,国家为了使自身主导的话语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即使进行耗资巨大的对外宣传也在所不惜。因此,大规模启动成本在话语领域的作用并不显著。参见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8页;田野:《大国竞争的根源:基于报酬递增机制的分析》,第91页。

理话语互动的基础上实现优势累积,获取国际话语权。

首先,学习效应指脱胎于既有系统的客观知识将会在新系统演进的过程中被行为体加以运用。在国家追求国际话语权时,学习效应反映在话语形成的语境平台与既有内容上。一方面,话语的形成和推广往往需要借助特定制度作为平台,将一些固化的表述作为后续话语生成的语境,由此产生路径引导的作用。话语形成中的平台往往使一些特定的概念得以制度化,为行为体的争论提供支持。^① 由于话语具有结构属性,既有制度中反复出现的固有概念将扮演新话语生成的语境,同时为话语内容施加一种难以违抗的共识。^② 从实践来看,特定语境下使用的表述往往会在制度的作用下成为影响国家后续行动的背景知识。在特定制度框架所设定的话语主题下,一些行为和言语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对后续的国家间互动产生持续的影响。由此,理解既有平台所提供的语境,并为后续的话语发展选择恰当的平台,是国家推动话语发展的必要考量。

另一方面,话语的迭代往往需要参考既有的话语内容。第一,新话语的形成需要通过对既有话语的内容进行参考以获取正当性。通过将当前的情景与历史相连接,话语内容的生成能够为话语主体赋予一种具有正当性的身份。^③ 同时,在话语争论的过程中,话语如果能够与正当性更高的话语相连,其主张就更能传播的过程中被接受。^④ 既有研究指出,国际组织在遭遇正当性挑战时,也常常会通过援引既有规范的方式,在叙事上重申自身在程序和规范上的正当性。^⑤ 第二,对既有话语内容的参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话语的有效性。由于话语内容更多体现了话语主体对于某一事物的认

① 陈拯:《“话语势能”构建与国际话语塑造》,第163—164页。

② 岳圣淞:《场域视角下的国际话语权:理论、现实与中国实践》,第139页。

③ Sarah Von Billerbeck, “Talk from the Top: Leadership and Self-Legitim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4, No. 3, 2022, pp. 7-8.

④ 陈拯:《“话语势能”构建与国际话语塑造》,第161页。

⑤ Tobias Lenz and Henning Schmidtke, “Agents, Audiences and Peers: Wh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iversify their Legitimation Discours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9, No. 3, 2023, pp. 921-940; Terence C. Halliday, Susan Block-Lieb and Bruce G. Carruthers, “Rhetorical Legitimation: Global Scripts as Strategic Device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ocio-Economic Review*, Vol. 8, No. 1, 2010, pp. 77-112.

知,为了使目标受众信服,话语主体需要将自身的叙述与目标受众的文化、经历、信仰及愿望相连,并有条理地将这些内容组织在一起。^①换言之,话语内容的有效性依赖于话语内容之间的逻辑,而一个逻辑严密的话语在前后内容上能够保持一致。^②国家能够将自身的战略叙事与某些政治迷思(political myths)相连接以使自身的修辞策略多样化,提升叙事的有效性。^③这种逻辑不仅反映在领导人对国内政治观众的政策叙事中,也反映在国家追求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逻辑性更高的叙事能更有效率地使一国的话语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同,从而更有效地塑造这一话语的权威,实现优势累积。同时,对既有话语内容的参考不意味着对既有话语内容的全盘认同。针对特定时空背景,对既有话语内容的批判性继承和推陈出新是话语获取有效性的重要方式。综上,话语领域的学习效应不仅体现在语境对话语策略的推动作用上,还体现在既有话语对新兴话语的正当性赋予和有效性助推层面。基于学习效应,国家通过议程设置等方式在话语领域形成初始优势,并在此基础上推动话语的报酬递增。

其次,协调效应是指单一行为体的行动能够引起系统内其他行为体的协同。换言之,单一系统是否具有对其他系统的网络外部性,是判断其是否具有协调效应的重要标志。^④在国家追求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协调效应主要体现在国家提出话语的领域间互动,以及进行话语传播的层次间互动两个方面。一方面,国际治理话语的互动会产生外溢效应,使话语逻辑在对单

① Lawrence Freedman,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Strategic Narratives," in Beatrice De Graaf, George Dimitriu, and Jens Ringsmose, eds., *Strategic Narratives, Public Opinion and War: Winning Domestic Support for the Afghan War*,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② Beatrice De Graaf, George Dimitriu and Jens Ringsmose, "Shaping Societies for War: Strategic Narratives and Public Opinion," in Beatrice De Graaf, George Dimitriu, and Jens Ringsmose, eds., *Strategic narratives, public opinion and war: Winning domestic support for the Afghan War*,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 10-11.

③ Olivier Schmitt, "When Are Strategic Narratives Effective?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Discourse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Myths and Strategic Narratives,"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39, No. 4, 2018, pp. 487-511.

④ Paul Pierson,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2, 1997, p. 16.

一领域产生直接影响的同时,还能够对其他领域的话语变化产生间接的影响作用。由于国家的对外话语需要保持逻辑上的连贯以提升其有效性,这使得不同领域话语的底层逻辑由此产生了一定的相似度,从而使单一领域的话语对其他领域的话语生成和传播带来潜在的推动效应。因此,国家在一个领域的核心关切以及对外政策立场所凝结的话语可能会以相似的表述体现在其他领域。以“安全”这一对外政策话语中的核心概念为例,随着国家间竞争的演进,“安全”概念的使用不再局限在传统的高政治领域,而是广泛体现在金融、投资、文化等诸多领域。随着安全问题的建构,被激活的话语将会为不同领域的政策变化和调整提供认知的桥梁,“安全化”的话语所具有的协调效应也会对国家获取国际话语权产生重要的影响。^①

另一方面,国家在国际和国内等不同层次使用的话语之间也具有高度的协调关系,单一层次的话语将会在其他层次得以体现并产生影响。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国家对国内或国际政治观众就特定问题进行单独话语输出的难度不断增加,其对外政策话语常常会在国内、双边、区域及全球层次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国家针对特定问题,或是对特定群体的话语传播会产生显著的扩散效应,使得在国内层面推动话语传播的过程可能会受到来自国际层面已有话语的影响,反之亦然。因此,不同层次话语之间的相互影响使得国家需要在考虑对特定对象的话语策略的同时,兼顾对其他主体的可能影响。当单一的话语内容能够在多个层次的话语受众中产生积极影响时,话语内容的正当性和有效性都将大幅提升,国家也更有可能会获得国际话语权。综上,

① Jelena Subotić, “Narrative, Ontologic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Change,”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2, No. 4, 2016, pp. 610-627. 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化”理论产生了诸多成果,部分代表性的研究及评述可参见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ondon: Lynne Rienner, 1998;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Slippery? Contradictory? Sociologically Untenable? The Copenhagen School Repl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3, No. 2, 1997, pp. 241-250; Holger Stritzel, “Towards A Theory of Securitization: Copenhagen and Beyond,”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3, No. 3, 2007, pp. 357-383. 一个有关安全化话语如何影响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案例研究可参见 Hai Yang, “Securitization, Fame Alignment,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US Chip Export Controls on China,”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7, No. 5, 2024, pp. 961-984.

由于话语在议题领域方面具有外溢效应,在不同层次中又具有扩散效应,话语内容之间的协同作用将导致国家的单一话语变化产生连锁反应。

最后,适应性预期是指,系统中既有路径的生成和大量采用将会影响行为体的预期,使其按照既定路线行动,并不断强化既有路径。与学习效应不同的是,适应性预期更加强调主观知识对国家获取话语权所产生的影响。^①具体而言,叙事形成的剧本(script)与图式(schema)能够对行为体当前及未来的行为造成影响。通过组织话语形成叙事,国家可以将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通过某些特定的概念和经验与当前相连,从而使自身形成对未来的预期。预期是叙事剧本或认知图式中的核心环节,行为体往往会基于自身在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主观知识对新输入的信息进行处理,对未来展开预测。^②在政治学的研究中,这种基于叙事所产生的剧本将会以特定方式塑造政治行为体的行动模式。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指出,国内行为体在抗争活动中的逻辑类似于按照剧本展开的表演,人们从历史经验中习得了特定的表演模式,而在需要提出诉求时则倾向于使用这些表演模式。^③随着特定叙事被越来越多的行为体采用,它能够从其他叙事中脱颖而出,为后续采用该叙事的行为体提供更充足的话语权威。

在国家获取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不同的叙事剧本将影响国家间未来互动的模式。正如悲剧叙事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造成的重大影响一样,对于国家而言,叙事剧本的出现不仅描述了其当前的身份与相应的行为,同时还塑造了其可能采取的行动。^④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某一叙事剧本将会

① 田野:《大国竞争的根源:基于报酬递增机制的分析》,第92页。

② Deborah Tannen, "What's in A Frame? Surface Evidence for Underlying Expectations," in Deborah Tannen ed., *Framing in Discour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6; Robert N. Ross, "Ellipsis and the Structure of Expectation," *San Jose State Occasional Papers in Linguistics*, Vol. 1, 1975,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136558.pdf>, 访问时间:2024年10月26日。

③ 参见查尔斯·蒂利著,王子夔、朱联璧译:《抗争表演》,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

④ 关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悲剧叙事”如何影响国家间行为,部分研究可参见 Richard Ned Lebow, *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Ethics, Interests and Ord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Alister Wedderburn, "Tragedy, Genealogy 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4, No. 1, 2018, pp. 177-197.

在大量国家接受的前提下成为约束国家后续互动的规范性力量,并为这一叙事的主导国提供话语权。由于该叙事剧本得到了大量采用,其他国家将会基于该剧本提供的叙事走向对未来的互动产生特定的预期,同时调整自身的行为。综上,适应性预期充分体现在叙事过程中,在剧本和图式等结构化预期的影响下,国家未来的话语和行为会不断受到当前话语的影响。随着其他国家逐渐采纳叙事剧本的约束,特定剧本将得以突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该剧本所反映的治理话语将呈现出螺旋式强化的特征,并最终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上述三个机制说明了报酬递增在国家获取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发挥的具体作用。基于学习效应,国家能够在参考既有语境和话语内容的基础上提升新话语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基于协调效应,国家不仅能够将话语的影响从单一领域扩展到其他领域,还能够使话语实现跨层次的传播。基于适应性预期,国家能够在大多数国家接受其治理话语叙事的基础上,约束接受国对未来话语走向的认知,实现话语的自我加强。三个机制的侧重点由表 1 所示。

表 1 国家获取国际话语权过程中的报酬递增机制

机制	侧重点	在话语领域中的体现
学习效应	既有客观知识的影响	语境平台、既有内容
协调效应	系统间互动	话语领域、互动层次
适应性预期	主观认知对未来的影响	叙事剧本与图式

来源:笔者自制。

综上,报酬递增的三种机制充分作用于国家获取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在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的作用下,国家在话语领域中将充分调动可利用的资源,推动话语优势的建立与不断累积。从国家累积话语优势的过程来看,三个机制的介入时段存在一定的顺序。国家形成系统性的话语策略既需要利用既有语境和平台的支持,还需要从既有的话语内容中获取正当性,提升自身话语内容的有效性。在对既有语境和话语内容进行利用的基础上,国家可以寻机在某一话语上形成先发优势。因此,学习效应往往首先作用于国家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并持续发挥作用。随着治理话语体

系的逐渐完善,国家在单一话语领域的优势将不断外溢至其他领域,话语内容的影响也将从某一层次向其余层次扩散。因此,协调效应的介入能够在学习效应的基础上使得国家将自身的优势扩大。此时国家所拥有的系统化的话语体系已经为其在部分领域形成特定的话语剧本和图式奠定了基础,这将推动话语受众对未来的话语发展方向形成适应性预期。随着学习效应和协调效应持续发挥作用,既有话语体系能够将优势固化,在此背景下,话语受众对国家话语的预期将使话语实现自我加强,从而推动国家在话语领域优势的不断累积,并获取国际话语权。故报酬递增的机制不仅体现在国家话语优势在某一时点上的静态优势,还体现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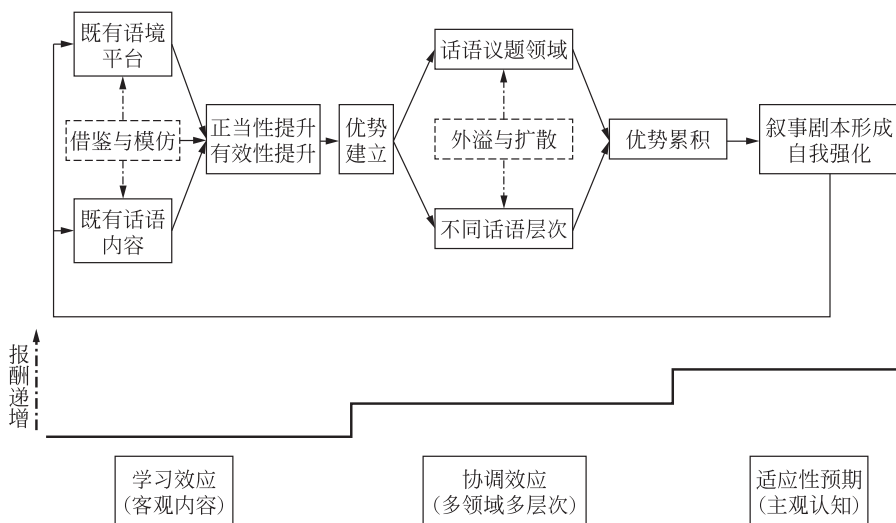


图1 报酬递增机制在话语领域的动态作用

来源:笔者自制

下文将以“自由国际秩序”为例分析美国的国际治理话语是如何实现报酬递增的。通过对该案例的实证分析,本文将说明国际治理话语可以在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的作用下实现报酬递增,从而成为特定国家获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动力。

三、国际治理话语的报酬递增： 以“自由国际秩序”(1945—2008年)为例

二战结束后,美国在观念层次有效地统合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实现了以其为核心的话语体系的扩散。以“自由”“民主”等概念为核心,美国在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构建了以自身为主导的战后西方国际秩序。这一秩序被此后的西方学术界称之为“自由国际秩序”。^①从结果来看,“自由国际秩序”不仅由美国主导塑造,更成为了美国在战后推动外交的核心动力。^②尽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6年民粹主义兴起的冲击下,“自由国际秩序”遭遇了挑战,美国的外交政策也遇到了巨大的危机,^③有学者甚至认为其“注定失败”,^④但其仍然是美国在国际治理中进行外交联合的观念核心。从

① “自由国际秩序”作为一种学术话语体现在对战后世界秩序的研究中,包括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等学者对美国主导的经济、安全等关系进行了梳理,并使用“自由国际秩序”等词汇进行概括。部分研究参见 Stephen D. Krasner, “US Commercial and Monetary Policy: Unravelling the Paradox of External Strength and Internal Weakn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1, No. 4, 1977, pp. 635-671; Joseph Nye, Jr.,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5, No. 2, 1990, pp. 177-192. 2006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妮·玛丽·斯劳特(Ane-Marie Slaughter)与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主持发布了一份名为《铸造法制之下的自由世界——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报告,对美国应如何主导“自由国际秩序”进行了界定,产生了重大影响。参见 G. 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 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https://dml.armywarcollege.edu/wp-content/uploads/2023/01/Princeton-Project-Report-National-Security-in-21st-Century.pdf>, 访问时间:2024年10月27日。

② Global Agenda Council on the United States, “Strengthening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Brookings, April 25, 2016,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strengthening-the-liberal-world-order>, 访问时间:2024年10月27日。

③ 左希迎:《美国外交政策的危机及其根源》,载《外交评论》,2022年第3期,第21—47页。

④ Emanuel Adler and Alena Drieschova, “The Epistemological Challenge of Truth Subversion to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5, No. 2, 2021, pp. 359-386; John 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3, No. 4, 2019, pp. 7-50.

1945年二战结束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作为一种国际治理话语的“自由国际秩序”使美国在冷战和全球化进程中拥有了显著的话语权优势,并对战后国际关系的走向产生了重要的约束作用。因此,在物质领域的优势之外,“自由国际秩序”作为美国的国际治理话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对西方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生成与演进提升了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国际话语权,并在一定程度上缔造了冷战后的超级全球化进程。

(一) “自由国际秩序”的内涵及演进

“自由国际秩序”往往指代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由美国主导的,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要成员的国际秩序。^①在既有研究中,这一概念与“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有一定相似之处,二者均强调了以“民主”“自由”等价值观为基础的话语概念在美国对外政策中所发挥的作用,但在作用时段上存在一定差异。^②“自由国际秩序”在内涵上指定了特定的价值观念,这至少反映在四个不同的侧面。首先,这一概念强调了对贸易和汇率的开放态度。基于对战间期贸易壁垒的反思,自由和开放的观念对战后国际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作为国际经济自由化的理念支撑而存在。其次,这一概念强调了对多边主义和规则的重视。随着二战的结束,为了避免再次走向冲突的深渊,国际规范成为国家间互动的行为准绳。再次,这一概念强调了民主的韧性与合作安全的重要性。战后的西方民主国家常常通过共有的规范和价值协调彼此的行为,在这些规范的基础上通过合作而非正式的联盟关系来保障彼此的安全。最后,这一概念强调社会发展的动态性。战后形成的自由国际秩序不是静态的,而是持续处于发展与更新的状态。^③

^① David A. Lake, Lisa L. Martin and Thomas Risse, “Challenges to the Liberal Order: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5, No. 2, 2021, pp. 225-257.

^② Alexandra Homolar and Oliver Turner, “Narrative Alliances: The Discursive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0, No. 1, 2021, pp. 203-220.

^③ G. John Ikenberry, *A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Crises of Global Ord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综上,以自由、多边主义和民主、进步等关键概念为核心,“自由国际秩序”反映了美国在二战后对国际秩序的综合认知。

“自由国际秩序”以二战结束为起点,至少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演进。^① 二战后美国在战后重建和对苏遏制方面主导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秩序被认为是“自由国际秩序”的开端。在二战结束后,面对着意识形态分歧带来的竞争压力,美国不仅借助自身的物质资源对欧洲和亚太区域进行了选择性的重建,同时还将自身所信奉的价值观念以制度化的方式予以固定。正如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所指出的,美国战后霸权建立在物质基础和治理的自由主义原则上,这种被称为“1945年安排”的政治构想从两个方面对战后的政治秩序造成了影响。^② 一方面,随着战后美苏关系的恶化,美国需要制定对苏联的遏制战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需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建立一个由自己主导的阵营。另一方面,为了维持阵营的稳定,美国需要在物质和观念层面对阵营内的盟友提供支持。因此,美国在战后主导的政治秩序不仅需要维持对外的统一战线,还需要为己方阵营提供明确的秩序引导。在此背景下,“自由国际秩序”成为满足上述两方面需求的话语核心。

从对外的角度看,“自由国际秩序”是区分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身份象

① 伊肯伯里将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国际秩序称为“自由国际秩序 2.0”,其认为一战结束后由美国总统威尔逊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者尝试建立的国际秩序可以被视为自由国际秩序的 1.0 版本,而二战结束后美国主导建立的贸易、金融和安全秩序是自由国际秩序的 2.0 版本。在其看来,自由国际秩序还存在 3.0 版本,在这一秩序中非西方国家可以融入到美国主导建立的既有国际制度中。博泽尔与祖恩则将“自由国际秩序”分为冷战间的 1.0 版本和冷战后的 2.0 版本。而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一份报告中则指出,战后秩序在时间上存在区分,冷战秩序(1945—1989)后形成的冷战后秩序(1989—2005)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两种秩序划分。参见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3.0: America and the Dilemmas of Liberal World Order,”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7, No. 1, 2009, pp. 71-87; Tanja A. Börzel and Michael Zürn, “Contestations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From Liberal Multilateralism to Postnational 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5, No. 2, 2021, pp. 282-305; Michael Mazarr et al., “Measuring the Health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RAND Corporation, 2017,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1994.html, 访问时间:2024年10月28日。

② 参见约翰·伊肯伯里著、门洪华译:《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9 页。

征。1946年,丘吉尔在著名的“铁幕演说”中强调了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对美国及其盟友带来的巨大威胁。在此之后,杜鲁门在演讲中不仅强调了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同时还从身份界定上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相区隔。这一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战后纲领强调了美国作为自由主义“领导者”所应发挥的作用。在此背景下,“自由国际秩序”在战后被美国及其盟友广泛使用,并随着冷战的演进而成为美国长时间内应对全球治理挑战所秉持的核心观念。从对内的角度看,“自由国际秩序”是美国在战后统合盟友,推动集体行动的重要话语工具。伊肯伯里认为,美国在二战后肩负着终结20世纪30年代经济敌对与政治动荡的使命。而在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美国又面临着重建德日与约束欧洲的现实挑战。因此,美国需要将战后民主国家锁定在一个开放与接受管理的秩序中,而单纯的权力政治难以实现这一目标。^①在此基础上,美国在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主导下建立了一系列国际制度,并通过“马歇尔计划”等措施推动了欧洲的重建。由此,通过制度构建等方式,美国将自身推崇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以国际制度为载体向外传播,从而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集体行动。

随着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的推进,“自由国际秩序”得到扩展,进一步成为美国在冷战后参与全球治理进程的话语基础。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受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等外生冲击的影响,美国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力受到质疑,但“自由国际秩序”所主张的规则与价值仍然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认同的主流,战后建立的国际制度仍然以既定的路线影响国家间的互动。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扩展,各国普遍通过新自由主义的方式解决国内的发展问题,而美国则成为这一秩序的主导者。1989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在演讲中表示,美国在过去四十多年中为现代化的世界贸易体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世界贸易体系中发挥的主导作用有助于“确保世界上的国家的自由与稳定”。^②面对这

① 约翰·伊肯伯里:《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第156页。

② George Bush, “Remarks at the Swearing-in Ceremony for Carla A. Hills as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February 6, 1989,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marks-the-swearing-ceremony-for-carla-hills-united-states-trade-representative>, 访问时间:2024年10月29日。

一情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认为以规则为基础的民主体系和发展模式适用于解决全球的发展问题。^① 尽管福山的观点受到了诸多批评,但仍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的优势地位和其主导的价值观念的飞速扩散。

在这一时期,“自由国际秩序”的广泛传播得到了两方面因素的推动。一方面,美国政府在战略上积极推动这一话语体系。在美国政府看来,保持并锁定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需要在各个领域做出努力,包括防止全球盟友中出现类似日本的竞争对手、说服关键国家接受全球秩序的单极化等。而上述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其他国家如何看待美国的主导地位。^② 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认为,苏联的解体不仅彰显了美国在冷战后的主导地位,还帮助美国认清并利用这一地位塑造冷战后的全球秩序。^③ 通过将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以话语形式从西方阵营内部向外部扩散,美国能够在战后对盟友和新兴国家进行约束,巩固自身霸权。原本存在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话语体系得以扩展,“自由国际秩序”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为“自由国际秩序”这一话语的传播创造了机遇。在这一时期,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将经济自由主义视为解决自身发展问题的药方,也普遍将民主制看作是本国政治发展的理想模式。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全面拥抱了自由民主价值观,调整了本国的政治经济模式。而中国也在20世纪90年代选择“入世”,将改革开放的成果加以巩固。作为一种话语体系,“自由国际秩序”在冷战结束之后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在事实上维持了美国在战后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因此,“自由国际秩序”在冷战后的扩散为美国在全球治理进程中话语权的获取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①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1989, pp. 3-18.

② “Draft of FY 94-99 DPG,” The U. 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April 16, 1992, <https://www.archives.gov/files/declassification/iscap/pdf/2008-003-docs1-12.pdf>, 访问时间:2024年10月29日。

③ Hal Brands, *Making the Unipolar Moment: U. 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Rise of the Post-Cold War Ord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317.

(二) “自由国际秩序”构建中的报酬递增机制

作为一种国际治理话语,“自由国际秩序”使美国在二战后确立了话语层面的优势,并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形成了系统化的价值体系。对于美国而言,“自由国际秩序”不仅有着强大的语境平台和客观内容的支持,同时还在多个领域与复合层次发挥作用。在此基础上,美国及其盟友对该话语的形成了强有力的认同与预期,以“自由民主”为剧本促进了彼此间的互动。在学习效应、协调效应与适应性预期的影响下,“自由国际秩序”在二战后提出至冷战结束后不断推动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实现话语优势的累积,巩固了美国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主导地位。

首先,从学习效应的角度看,“自由国际秩序”不仅在二战后国际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还受到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话语内容的影响。战后国际制度的建立为观念和规范的互动提供了平台,并以制度建构的方式推动了“自由国际秩序”的发展。此外,作为一种国际治理话语的“自由国际秩序”与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紧密相连,从而获得了充分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在语境平台的支持和既有内容的基础上,美国通过“自由国际秩序”这一话语在战后国际关系中积累了话语优势。

一方面,二战后国际制度的建设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话语沟通提供了客观的语境平台,而美国对平台的主导使其能够增强自身话语的影响力。一战后国联的失败为二战后国际组织的建立提供了充足的经验和教训,这使二战后的国家间互动更加注重制度平台所发挥的影响。出于冷战和大国竞争的目的,美国分别在欧洲和亚洲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轴辐”联盟体系,以多边和双边的形式管理自身和盟友之间的安全关系,上述制度安排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提供了规范上的准绳。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中明确强调了成员国对“自由”“民主”等价值所形成的共识,并重申北约各缔约方的行动将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原则展开。^① 北约于冷战

^①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April 4, 1949,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7120.htm, 访问时间:2024年10月30日。

结束后向外扩员,安全治理的碎片化在冷战后向着美国主导的一体化进程迈进,在这一过程中,北约等既有语境平台的互动规范将使美国倡导的话语概念成为对新成员国行为的约束,这将提升美国的制度性话语权。^① 二战后国际贸易体制的建立也推动了美国主导的话语逻辑的实现。朱迪斯·戈德斯坦(Judith Goldstein)和珍妮·高娃(Joanne Gowa)认为,战后国际组织的制度安排不仅为美国的承诺提供了可信度,同时还使得自由贸易成为了国家战略选择的理性均衡。^② 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它们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的重要前提就是这些国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接受“规则”“自由”等话语概念。简言之,“自由国际秩序”这一话语在战后国际制度的基础上,使“自由民主”等概念成为了日后美国与其他国家互动的特定语境,这为美国获取话语优势打下了基础。

另一方面,“自由国际秩序”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一脉相承,这使其能够通过对既有话语概念的使用来提升自身话语概念的正当性和有效性。“自由国际秩序”在思想渊源上可以追溯至格劳秀斯、洛克等学者对于法治、自由、民主等价值的论述,尤其受到康德“永久和平”思想的重要影响。“自由国际秩序”所提出的核心理念与康德思想中有关民主、国际制度和经济相互依赖等重要概念相承接。^③ “自由国际秩序”对既有观念的承接也使西方国家能够在这一话语体系中更快形成共识。二战结束后,美国将国际主义的原则贯彻到战后秩序的建立中,为“自由国际秩序”在二战后满目疮痍的欧洲进行传播提供了充分的正当性和有效性。与一战后不同的是,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得到了西方阵营的广泛支持。通过将源于19世纪末期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发展的核心概念塑造为战后和平与繁荣的概念基础,“自由国际秩序”这一话语体系满足了美国主导战后西方世界的价值需

① 岳圣淞:《制度性权力场域下的大国博弈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4年第6期,第20—35页。

② Judith Goldstein and Joanne Gowa, “US National Power and the Post-war Trading Regime,” *World Trade Review*, Vol. 1, No. 2, 2002, pp. 153-170.

③ T. V. Paul, “Globalization, Deglobalization and Reglobalization: Adapting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7, No. 5, 2021, pp. 1599-1620.

要,“自由国际秩序”所包含的理念也成为了美国主导的战后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冷战后,“自由国际秩序”这一话语的进一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球化的扩张,成为了美国在冷战后与其他国家进行互动的话语基础。

其次,从协调效应的角度看,“自由国际秩序”为美国的权威行使提供了综合性的话语基础,主要体现在政治、安全、经济等不同领域间的外溢效应,以及在二战后及冷战结束后不同层次间的扩散中。“自由国际秩序”所包含的话语原则不仅促进了美国在冷战时期与盟友在政治、安全、经济等多个方面的协同,还推动了非传统西方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融入。这两个方面共同促进了美国在全球治理进程中话语权威的行使,并在客观上推动了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秩序的建构。

一方面,“自由国际秩序”不仅塑造了一种共同的政治身份,还推动了美国在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与盟友之间特有的互动模式。“自由国际秩序”所强调的“民主国家”等身份特质为美国统合己方阵营提供了一种感召力,并成为二战后资本主义阵营内部进行政治、经济及安全合作的粘合剂。在欧洲国家的“邀请”下,美国抛弃了长期以来摇摆不定的立场,从孤立主义全面转向了国际主义,承担起了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重建的责任。^② 随着对德国和日本的改造与对欧洲的重建,美国在战后实现了势力的全面扩张,美国所秉持的自由国际主义立场也在安全、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等关系中得到全面体现。无论是北约的建立,还是自由贸易体制的建立,美国及其盟友都将“自由”“民主”等话语概念贯穿其中,将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层面的合作与特定的国际秩序相联系。1949年3月,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明确提到了北约与欧洲复兴计划之间的关系,指出北约与欧洲复兴计划都意在实现“一个和平、繁荣和稳定的世界”,而北约的成功建立则有赖于战

① Beate Jahn,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Historical Trajectory and Current Prospect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No. 1, 2018, pp. 43-61; Inderjeet Parmar, “The US-led Liberal Order: Imperialism by Another Nam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No. 1, 2018, pp. 151-172.

② Geir Lundestad, “Empire by Invit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1945—1952,”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3, No. 3, 1986, pp. 263-277.

后欧洲政治经济合作所取得的成果。^① 美国主导的战后贸易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跨大西洋安全关系与亚太区域“轴辐”联盟体系,安全战略的目标和话语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在贸易合作的内核中。1950年1月,美国主导建立了“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CoCom,简称“巴统”)。这一机构不仅在经济方面服务于美国的冷战政治目标,同时还协调了美国与盟友之间的经济关系。“巴统”是美国对其盟友“软硬兼施”以实现其冷战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由此,美国不仅协调了与盟友之间的经济关系,补偿了其进行出口管制的成本,还推动了安全目标的达成。^② 美国政府认为,美国主导的经济防御系统依赖于“自由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作为更宏观的安全与政治合作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③ 在合作过程中,美国通过宣传自己的价值观念以及选定身份,建立起了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体系,“自由国家”“自由世界”等话语概念是美国在多个领域统筹盟国间行为的重要抓手。领域间的秩序协调和话语外溢成为二战后美国构建“自由国际秩序”的重要动力。

另一方面,“自由国际秩序”在不同层次间实现了扩散。在二战结束后,美国在对苏联竞争的背景下推动了“自由”“民主”等话语的扩散,并构建了以自身为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冷战结束后,这套话语体系又从西方阵营内部向外扩散,影响了冷战后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道路选择。在“国际秩序”等话语的作用下,新兴市场国家逐步融入现有国际秩序,推动了全球化的快速推进。首先,尽管“自由国际秩序”所包含的话语内容受到欧洲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影响,但二战后美国的推动仍然使“自由国际秩序”这一国际治理话语所包含的价值观念的身份定位向非传统西方国家扩散,并使其成为美国主导下秩序的成员。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演讲中提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确保各国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和平

① “Statement on the North Atlantic Pact by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U. S.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March 20, 1949,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9v04/d125>, 访问时间:2024年11月1日。

② 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页。

③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Gene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Matters, Vol. 1, Part 2*,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 1208.

发展”，而美国应该帮助“自由人民维护其制度和国家完整。”^①在此基础上，美国将战后“自由世界”的范围加以扩展，并在更大范围内发挥自身价值观念的影响力，包括土耳其、日本等国家后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融入了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成为这一秩序中重要的非西方成员。其次，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在冷战结束后对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和政治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苏联解体后，东欧国家普遍进行了民主化改革，在政治与经济领域接受了自由化的概念。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逐渐了解了“自由国际秩序”在不同领域的概念内涵。尽管中国对“自由国际秩序”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和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并不认同，但这不妨碍其在经济层面开始融入自由贸易体系。^②通过参与全球竞争，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成为了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③从结果看，美国扩展了“自由国际秩序”所包含的成员范围，并使自身推动的话语概念在原有的价值体系的基础上丰富和完善。

再次，从适应性预期的角度看，尽管面临着其他叙事剧本的竞争，但“自由国际秩序”这一叙事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提供了一套可模仿的剧本。对于战后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国家而言，“自由国际秩序”的广泛传播使它们在互动过程中对他国的价值观念有着相对确定的预期。美国在战后的话语优势并非一蹴而就，其在二战结束后面临着来自苏联阵营等不同形式的叙事之争。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外文化宣传达到了高峰，意图通过芭蕾舞和太空技术等文化与科技符号向西方国家展示苏联模式的优越性。^④但随

① “President Truman’s Message to Congress,” The U. 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March 12, 1947, <https://www.archives.gov/milestone-documents/truman-doctrine>, 访问时间:2024年11月1日。

② Ruonan Liu and Songpo Yang, “China and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A Pragmatic and Dynamic Approach,”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9, No. 4, 2023, pp. 1383-1400.

③ T. V. Paul, “Globalization, Deglobalization and Reglobalization: Adapting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p. 1612.

④ Fredrick Charles Barghoorn, *The Soviet Cultural Offensive: The Role of Cultural Diplomacy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336.

着勃列日涅夫上台,苏联的叙事模式出现了巨大的转变,美苏力量格局的对比变化与勃列日涅夫本人的影响导致了苏联在赫鲁晓夫时期的对外叙事模式未能长期持续下去,克格勃主导下的秘密行动模式成为了苏联宣传模式的新主流。^①在此背景下,苏联自身未能保持叙事剧本的统一性,其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在解体之前就已走向衰落。此外,尽管诸如“不结盟运动”以及“77国集团”等叙事概念在冷战时期作为发展中世界的代表,发出了新兴力量在国际事务中的声音,但国际秩序的主导权仍然长期把持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手中。^②随着冷战的结束,“自由”“民主”等概念被其他国家接受与使用,美国的价值观念将会以多种形式潜藏在全球治理的实践进程中。与之相对比,其他并行的叙事剧本均局限于特定的议题范围。在“自由国际秩序”的引导下,美国主导了战后欧洲的重建,并重塑了过去百年间欧洲地缘政治的格局。更关键的是,大量的非西方国家开始在规则和制度上成为“自由国际秩序”的一员,其对战后国际法和规范的接受推动了“自由国际秩序”对全球治理进程的影响。由此,“自由国际秩序”这一国际治理话语被欧洲和非西方国家主动运用,并支撑了美国在战后主导建立的话语体系和制度环境。

冷战结束后,西方民主国家深层观念结构的相似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在对美国制衡的缺位,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减少了权力制衡的必要性,“自由国际秩序”所形成的适应性预期使美国以外的大量国家主动认同了美国主导全球秩序的合理性。^③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在战后的稳定发展为其他国家加入、留在并遵循这一叙事剧本和话语体系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自由国际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填充了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由于退出这一叙事剧本就意味着落单,大量国家的融入使得正在观望的剩余国家对未来的国际秩序发展产生了相对确定的预期,从而主动融入“自由国际秩序”中。因此,冷战后全球化的扩展与2008年前“一超多强”格局的形

① Nicholas J. Cull and B. Theo Mazumdar,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in Artemy M. Kalinovsky and Craig Daigle,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 326.

② 李安山:《世界秩序变革中的“全球南方”——基于历史发展的视角》,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3期,第23页。

③ 约翰·伊肯伯里编、韩召颖译:《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成,不仅与美国在冷战后所拥有的物质实力有关,还与美国所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被其他国家所接受所形成的适应性预期有关。在“华盛顿共识”等经济自由化等话语的影响下,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沿着自由贸易的路径持续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接轨,同时将“民主”“国际法”等话语概念嵌入到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对外关系中,一种持久的、相对协调的战后国际秩序由此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遵从中得以发展。这种由适应性预期所推动的主动遵从在冷战后的一段时间中得到延续,并在“慈善的霸权”领导下实现自我强化。^① 随着美国以外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主动遵从,适应性预期在“自由国际秩序”这一国际治理话语中得到了体现。这种话语共同体发挥的作用将扩大美国在学习效应和协调效应基础上建立的话语优势,并使美国在冷战结束后获得了“自罗马帝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国际话语权威。^②

上述三个机制解释了“自由国际秩序”如何作为一种国际治理话语提升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自1945年到2008年,“自由国际秩序”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威获取与行使提供了递增的话语权优势,并在一段时期内塑造了美国的单极霸权。但正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指出,当有国家相信改变一种国际体系是有利可图的,它就会寻求改变这一体系。^③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作为主导者的美国对“自由国际秩序”的认知,而2017年特朗普政府的上台也改变了美国对以联合国和国际法为核心的战后秩序的认知,美国开始重新思考“自由国际秩序”这一国际治理话语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并通过单边主义的方式干预现行国际秩序。尽管拜登政府于2021年上台后以价值观为核心调整了以美国为核心的盟伴体系,试图重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④延续“自由国际秩序”的生命周期。但

① 约翰·欧文:《跨过自由主义与美国的主导地位;或,旁观者眼中的慈善》,载约翰·伊肯伯里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第238—259页。

② 斯蒂芬·沃尔特:《维持世界的“失衡状态”:自我克制与美国的对外政策》,载约翰·伊肯伯里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第121—154页。

③ 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杜建平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0页。

④ 赵明昊:《盟伴体系、复合阵营与美国“印太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6期,第26—55页;叶成城、王浩:《拜登政府价值观联盟战略初探》,载《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9期,第11—17页。

在特朗普再次执政的冲击下,“自由国际秩序”的回光返照难以扭转美国对当前国际秩序的反思。特朗普重新上台后,美国政治的保守化趋势愈发明显,^①以“全球化精英”等概念为靶子,特朗普及其政府官员倾向于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全球事务进行直接干预,不再优先考虑美国与盟友的价值协调。对于“自由国际秩序”这一国际治理话语而言,“美国优先”在叙事上与对原有的“自由民主”和“开放包容”等话语内容产生了巨大冲击,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国际秩序”对其他国家产生的适应性预期,自然也对美国获取国际话语权的报酬递增过程产生了负面影响。自2025年初开始,美国的外交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向。首先,特朗普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大规模的关税战,重塑了美国与全球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其次,特朗普政府公然要求获取格陵兰岛,使美欧关系出现了大幅波动。再次,特朗普政府在上任后进一步推动美国退出国际组织,动摇了美国在全球治理层面的话语权。在此背景下,美国冷战后奉行的自由主义外交战略恐难以为继。^②在跨大西洋关系出现裂痕的背景下,“自由国际秩序”这一话语在未来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四、结语

国家何以在与其他国家互动的过程中积累话语优势,获取国际话语权?本文认为,作为国家对国际体系中权威生成与行使的理想模式的具体表达,国际治理话语将遵从报酬递增的逻辑,主要通过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预期三个机制的作用使国家累积话语优势,获取国际话语权。首先,学习效应主要表现为对既有语境平台与既有话语内容的模仿和借鉴。学习效应可以提升国际治理话语的正当性和有效性,有助于建立初始优势。此后,协调效应推动国际治理话语的竞争在多领域和多层次外溢和扩散,并放大既有优势。最后,适应性预期固化国家对话语的认知,通过叙事剧本形成对未来发展路径的确定预期,推动国际治理话语走向自我强化。三个机制先后

① 张文宗、刘典知:《特朗普再次执政与美国政治的基本走向》,载《现代国际关系》,2025年第1期,第5—25页。

② 节大磊:《2024年美国大选与“后—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外交战略》,载《美国研究》,2024年第6期,第34—57页。

介入并发挥作用,维持了报酬递增过程的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对“自由国际秩序”这一国际治理话语进行分析,以美国为例说明了国际治理话语能够在报酬递增机制的作用下推动国家累积话语优势,获取国际话语权。

美国在二战后借助其构建的国际制度体系,将源自欧洲自由主义理论的话语概念加以固化,推动了以“自由”为核心的话语体系的构建,并同时实现了对内协调盟国行动和对外遏制竞争对手的目标,美国的话语优势也在这一时段得到建立。在上述学习效应的基础上,美国将特定的身份价值融入政治与经济合作的进程中,并通过特定的身份设置将话语发挥的作用外溢至多个领域。“自由国际秩序”在美国的推动下还实现了层次间的扩散,无论是二战后土耳其、日本等国家的加入,还是冷战后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融入,都体现了“自由国际秩序”所发挥的协调效应。“自由国际秩序”这一话语的广泛采用使得其他国家在二战后逐渐形成了对未来发展方向的确定预期,并有意识地调整自身发展的路径以实现“自由国际秩序”的贴合。在此基础上,冷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全面成为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有力工具,其他国家的主动遵从使美国在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实现了自我加强。

需要明确的是,话语领域报酬递增的过程也非始终持续且不可中断,来自环境的外生冲击和国家本身对话语运用的策略转变均会对特定治理话语的报酬递增过程产生影响。因此,明确特定话语在限定的时空背景下发挥的作用,是国家获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前提。因时因势调整自身的话语策略,是保持自身治理话语不偏离报酬递增轨道的必要条件。对于中国而言,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与其他国家有效互动,不仅需要推动物质领域的积累,还需要积极利用话语策略,以提升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① 物质实力和话语权威的协调发展,是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应对国际挑战的重要途径。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34页。